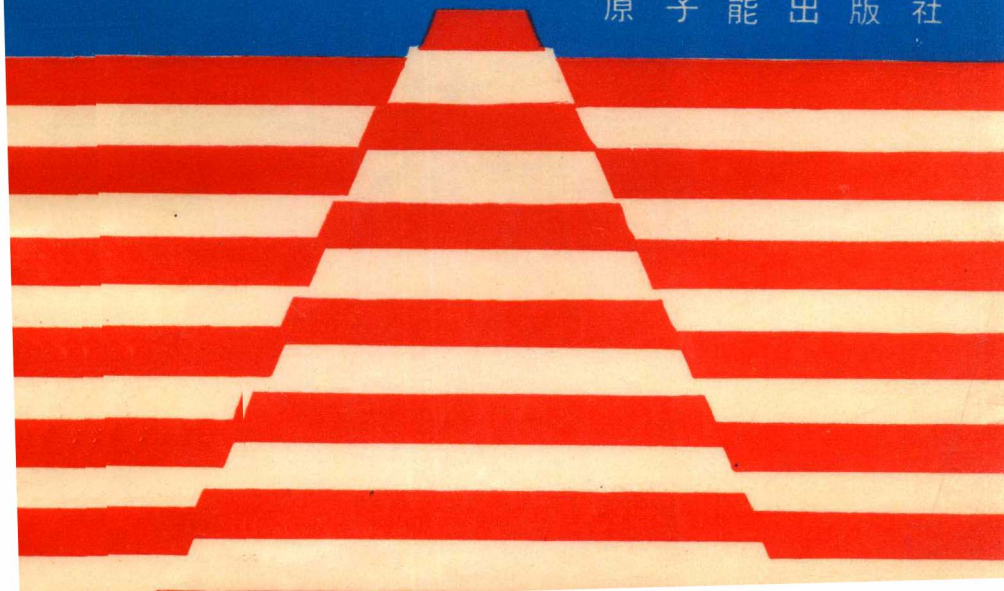


美国 尖端武器工业

原子能出版社



美国尖端武器工业

核工业部情报所武器室译

原子能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着重介绍美国尖端武器工业的活动情况。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美国不同时期的核武器政策，以及美苏之间进行的核谈判，叙述了美国尖端武器工业系统的一些情况及武器研制与生产活动。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美国国防工业集团中26家大公司的发展史、经营管理活动及产品特点。第三部分为本书的附录，列出了美国各种核武器系统及其他有关资料。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系统性强，为国内同类书籍所少见。

本书可供从事国防工业的各级领导、组织管理和计划人员使用，亦可供直接从事核武器工业、航天和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工业的科技人员，以及各军工院校师生和其他有关人员参考。

美国尖端武器工业

核工业部情报所武器室译

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北京2108信箱)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西便门南大道甲5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新华书店经售

(限国内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2.875·字数340千字

1986年10月北京第一版·1986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统一书号：15175·797

定价：3.25元

译 者 的 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尖端军事工业的兴起，军事工业在各国工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学地管理和有效地经营军事工业，特别是周密细致地组织好高度保密的尖端军事工业，正在受到各国的日益关注和重视。为此，我们翻译了《美国尖端武器工业》一书，奉献给读者。

本书译自“美国投资者咨询中心”1984年出版的《核武器工业》一书。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对原书内容作了某些删减，并增补了一些具体资料，但没有改变原作者的基本观点，对其中一些不一定恰当的提法也未作改动。第五章“核武器研制与生产”系译者根据日常工作中积累的大量资料撰写的。

本书第一部分阐述了美国核武器政策及美苏核谈判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苏军备竞赛的来龙去脉，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核武器工业系统以及核武器研制与生产活动。第二部分可使我们了解美国国防工业的管理体系，研究它们的管理程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以及各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业务来往，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第三部分对美国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情况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可供从事国防工业的人员参考。

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有：陈颂汾(兼统稿)、吕原、骆继湘、夏绥琴、刘进春、秦叔钦、张铨清、那学成、杨滢、杨宝根、唐信青、李曼莉、宁儒臣。李启廉、王连奎同志对本书书稿作了审校，核工业部军工局为本书出版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美国的战略政策和核武器系统.....	1
第二章	控制核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	19
第三章	工业界对核武器政策的影响.....	29
第四章	核武器工业.....	41
第五章	核武器研制与生产.....	66
第六章	国防部承包公司简介.....	106
6.1	阿维科公司.....	106
6.2	波音公司.....	114
6.3	通用电话电子公司.....	127
6.4	通用动力公司.....	133
6.5	通用电气公司.....	146
6.6	通用橡胶轮胎公司（通用航空喷气公司）.....	165
6.7	霍尼威尔公司.....	171
6.8	利顿工业公司.....	178
6.9	洛克希德公司.....	189
6.10	马丁·玛丽埃塔公司.....	203
6.11	麦克唐奈·道格拉斯公司.....	215
6.12	诺斯罗普公司.....	230
6.13	雷西昂公司.....	240
6.14	罗克韦尔国际公司.....	248
6.15	胜家公司.....	263
6.16	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	272
6.17	坦尼公司（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	286
6.18	联合技术公司.....	296
6.19	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	305
第七章	能源部承包公司介绍.....	317
7.1	阿莱德公司.....	317

7.2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323
7.3	E. I. 杜邦公司.....	330
7.4	EG&G 公司.....	335
7.5	孟山都公司.....	341
7.6	联合核资源公司.....	344
7.7	联合碳化公司.....	347
附录 1	与核武器有关的系统简介.....	352
附录 2	主要术语 (英汉对照)	391
附录 3	与核武器有关的机构简介.....	397
附录 4	与核武器工业有关的公司.....	399
附录 5	能源部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联合体分布图.....	405

第一章 美国的战略政策 和核武器系统

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于广岛前十一个月，一个同曼哈顿计划有联系的科学家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核子学简介》的报告。该委员会在此报告中声称：

“美国实现独立核武器的最大成效是，一旦纽约或芝加哥这样的城市遭到全面破坏，美国将随即对进攻者的城市进行更大规模的破坏性报复，希望对这种报复的畏惧会使进攻者不敢动手……[但是，]人类的整个历史告诫我们，这只是一种奢望，因为储备的毁灭性武器迟早要使用，尽管这只能使交战双方都遭到毫无意义的毁灭。”

上述说明可能是官方有关核威慑的第一个设想，即在原子时代，美国防止核破坏威胁的唯一途径，是以同样的威胁手段对付核打击。这种政策后来被奉为“确保摧毁论”，并成为核时代的军事战略——“威慑”的基础。

尽管有人认为美国的核垄断不会持续太久，以及威慑可能是唯一的防御手段，该委员会的报告还暗示：人们必须寻求另一种有前途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因为使用新型的恐怖性武器进行报复，这样的防御在道义上会使自己陷入困境。即使在道义上扪心无愧，该委员会中对“恐怖平衡”持悲观态度的人也会建议人们去寻求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美国首先寻求把所有核武器置于某种“国际监督”之下的可能性。当这个建议遭到苏联拒绝后，美国国内接二连三地提出制定核时代防御政策建议。自1945年以来，战略家、军界、政治家和公民们连续发表文章，提出了各种避免依靠“恐怖平衡”的方案。

正如伯纳德·布罗迪 (Bernard Brodie) 在1946年指出的, 所有自称的战略家不得不正视以下的基本事实: 1. 原子弹的存在; 2. 原子弹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和空前的。1952年美国氢弹爆炸以后对第二点的考虑更加突出。氢弹技术使武器的威力有可能超过广岛原子弹爆炸威力的1000倍。热核弹使用聚变能而不是裂变能, 从释放能量来说, 热核弹更为有效。

核时代的第三个基本事实是1949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彼此对立的两个大国都企图建立核武库。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 在1953年做过这样的比喻:“搏斗中的两只蝎子, 双方都能咬死对方, 但是, 各自都处于生命危险之中”。后来, 把一方用破坏性报复手段来威慑另一方的概念叫做“相互确保摧毁论”。

这种“相互确保摧毁论”从主张对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直到主张全面和立即单方面裁军。自广岛被原子弹轰炸至今的四十年里, 美国防务界关于核政策的辩论一直没有间断, 并且经历了多次的反复。某些专家认为, 这些辩论收效甚微, 不可能为“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设想出一种可信赖的选择方案。

所有核战略方案显然都不成熟, 致使模棱两可的美国核武器政策代代相传。在战略目标选择和打击方法方面, 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公开声明, 而且关于武器打击目标的实际政策常常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 核大国之间谈判的焦点是致力于控制军备竞赛问题。表面上看, 争取军备控制的最终目标是全面核裁军, 但是一些持不同政见的评论家们说, 最近军备控制会谈中提出的实际建议仅仅是调节军备竞赛, 而不是消除对恐怖的依赖。1983年初, 里根总统提出避免依赖核报复性威慑的另一种办法, 即通过长期地发展一种不可摧毁的防御体系来对付核打击。这种防御体系, 多数是依靠以外层空间为基地的武器系统 (简称天基武器系统)。里根总统甚至提出, 通过大量减少核弹头来支持这一设想。看来, 除

非找到新的可供选择方案，否则“依靠报复的幽灵，依靠相互威慑还是必要的”。

许多专家怀疑能否研制出一种对付核打击的可靠的防御系统。他们认为，里根总统的建议是一种破坏稳定的建议。建立完全有效的防御，存在着大量的技术障碍。里根总统对此也直言不讳。面对如此大的差距，里根提出的这种方案，只不过是寻求摆脱核困境所下的一着棋。

一、里根、温伯格和新的 核战略政策的辩论

尽管里根提出了长期发展防御系统的建议，但是其军事计划的核心仍是增强核进攻能力和改进核力量的指挥与控制。政府认为，这种努力为调整对苏联有利的潜在恐怖不平衡是必要的。在最近二十年间，苏联为赶上美国的核打击力量的水平而竭尽全力。里根认为，苏联在某些方面的力量现在已超过美国。然而，评论家们把核能力的差距视为毫无意义，这是因为双方都有实力摧毁对方。美国政府官员们担心，一旦苏联取得明显的优势，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因此，美国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规划了许多新的核武器系统。

核军备扩充、里根政府声明和所采取的政策激起了公众的批评。最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广泛的基层运动，要求双方停止（或“冻结”）生产核武器。评论家们不同意里根关于苏联取得重要领先的说法，他们对里根及其同僚们的某些煽动性的声明一向保持着警惕。

例如，1980年共和党提出了一个建立一种新的核体制的纲领，明确要求建立对苏联的军事优势。共和党的纲领还否定了“相互确保摧毁论”，认为核战争必定意味着双方自杀。

在里根执政的头两年，政府官员们公开谈论关于“是否可能赢得”核战争、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和里根所称的对“罪恶

的苏联帝国”的惩罚等问题。除了以最强烈的言词谴责苏联领导人之外，里根总统还认为，限制对欧洲的核战争是可能的。但里根的观点未被欧洲人或那些认为任何核对抗都可能迅速升级的美国战略家们完全接受。

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对众议院委员会强调指出，必须增加核武器的品种，以适应可能出现的各种核战争的需要。温伯格的高级助理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在其证词中同样强调核武器必须有作战能力。1981年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苏联问题高级专家、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曾说：“苏联领导人必须在和平改变他们的共产主义制度或走向战争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T. K. 琼斯(T. K. Jones) (前波音公司的高级职员，后来里根任命他为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帮办)等人提出了一个关于核战争的新观点。他在会见记者兼作家罗伯特·希尔(Robert Scheer)时说：在采取适当的民防措施保护居民和工业的情况下，经过一场全面核战争后，恢复建设时间“可能需二到四年”，并且90%以上的美国居民能够幸存下来。

这些见解和里根政府其他领导人的类似主张同公众的传统看法（即核战争将是灾难性的）是背道而驰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些官员的言外之意是，核战争作为一种比较合理的和能采用的对外政策应该予以重新评价。

美国政府拟定的三个战略文件有助于证实批评家们所持的这种观念。最明显的例子是1982年5月国防部长温伯格提出的五年防务指导规划。这个文件是里根政府草拟的第一个完整的军事政策纲要，它要求为“持久的核战争”做准备，并力求使美国核力量“占据优势，在有利于美国的前提下，迫使苏联尽早结束敌对行动”。有一位批评家评论道：“想在核战争中占优势的思想与赢得核战争的思想是同出一辙”。但是，在政府防务指导规划透露出来以后，温伯格坚持说，在核战争中占优势和赢得核战争是两码事。

防务指导规划强调一种称之为“砍头”的核打击目标战略。

这种战略“将使苏联（及其盟国）的整个军事和政治机构失效”，许多观察家们对此十分惊愕，因为这将产生一个问题，即如果苏联领导层不复存在，美国如何与苏联进行谈判？

此外，这个防务指导规划还强调在弹道导弹防御和天基武器系统方面的研究。1983年3月，里根总统果然发表了“星球大战”的电视讲话。

1982年末，作家希尔报道，白宫已草拟了一份《国家安全决议文件》（代号为NSDD13）。据他说，这是“美国政府的第一个宣言性的政策声明”。这个文件宣称：“美国战略力量一定能够赢得一场持久核战争的胜利”。

除这些行动外，政府还制定了一个新的“统一作战计划”（代号为SIOP6）。自1961年以来，“统一作战计划”一直作为确定战略核力量的打击目标、选择方案和武器分配的统一计划。历次的“统一作战计划”都是保密的，不过政策研究所的威廉·阿金（William Arkin）在批评政府的政策时说，他获悉，采用新的《统一作战计划》是为了构成更强大的作战能力，并在持久的战争中最终取得优势，同时为有限使用核武器提供更多的选择方案。

希尔在1982年出版的《准备足够的铁锹：里根、丛林和核战争》一书中写道：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的战略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希尔认为，“里根政府要么相信核战争是一种灾难，决意与苏联人在核武器方面周旋到底，有意识地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并向他们的帝权提出挑战；要么美国放弃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灾难的观点，并相信核武器能够作为有效的政治工具”。

不用说，希尔的论点未得到普遍的赞同。在那些持异议的人中间，为首的有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其他的政府官员。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奉行的政策是危险的或者严重地背离了过去的威慑概念。温伯格费尽心机地为现政府政策辩解，他在最近向国会提出的年度报告中，援引了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1961—1968年）年度报告和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1973—1975年）年度报告，试图表明现行

政策是“坚定不移地继承了二十多年来的美国战略主导思想”。

对五角大楼政策持尖锐批评态度的某些评论家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温伯格的。他们认为，政府很久以来就想扩大核武器的使用范围，而不仅是作为对最严重侵略所采取的最后手段。而且，他们说，里根政府计划建造的核武器及其有关设备（例如MX导弹、三叉戟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为增强战斗力对核武器的指挥与控制所做的种种改进）实际上几乎全开始于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时期。

纵观战略政策的历史，意见分歧一直来自对政策解释的混乱。看来无论温伯格或批评他的人都不能完全准确地阐明战略政策的历史演变。实际情况似乎要比争论双方所述的更为复杂。例如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政府执政初期，力图提出一种灵活反应战略，即温伯格为此受到批评的政策。事实上，肯尼迪政府执政初期的许多战略思想类似于二十年后里根及其同僚所奉行的路线。但是，麦克纳马拉后来逐渐从有限核战争和持久核战争的“灵活反应”战略后退了。在他结束国防部长任职时，反而为“相互确保摧毁论”提供很多的依据，但这种论点却遭到了温伯格的拒绝。

造成核战争政策解释混乱的原因是：

1. 在向公众说明政策时需要保守机密和规定具体要求，这就可能与实际的部署政策和武器的使用政策相矛盾。这样，美国宣告的政策通常是强调“确保摧毁论”的威慑效力，而实际的打击目标政策却强调军事目标，这和“确保摧毁战略”是不一致的。

2. 政府当局的说法往往不一致。例如，某些空军上层人士认为，美国在核战争中取胜是可能的，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合理的；而文职领导却不这样想。

3. 人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提出一种道义上、战略上和经济上均可接受的核武器学说。因此，政策有时会发生骤变（至少在公开讨论中是这样），结果出现明显的、频繁的自相矛盾和反复无常的现象。

4. 政府官员对核政策问题的想法混乱。在研究新的战略问

题时，决策人可能会遇到困难，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核武器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思想，而且关于热核战争人们也有其与众不同的设想。考虑到这样的悖论时，人们必须注意解释核武器战略思想的主要概念。

二、威慑、相互确保摧毁和打击军事目标

（一）威慑概念

诚然，威慑这一军事概念并不是新的。以报复威胁方式阻止敌方进攻的思想，自有战争以来就存在。一位战略专家解释道：“威慑意味着要使敌人明白，所花的代价和所冒的风险超出其预期的效益，从而使敌人不敢采取军事行动”。这个道理是简单的，但是在核时代里，核威慑概念的应用却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问题。

在理论上，进行威慑和进行战争是两回事。但是在核弹问世之前，至少对防御力量来说，这种差别几乎没有实际意义。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既可用于威慑进攻，在威慑失败时，又可用于抗击来犯者。

支持战后战略思想的观点认为，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和氢弹的更大破坏力）在威慑与战争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战略家们会感到，核武器可能是最终的威慑力量，它们的实际军事应用价值都是有限的，或是不存在的。万一核威慑惨遭失败，随之而来的是敌人发动全面核打击，对敌方实施威胁报复是否明智，这就很难说了，在遭受一次灾难的袭击之后，报复可能仅仅作为复仇，并且或许会挑起进一步的袭击。

因此，最重要的军事行为（打仗）退居到第二位，而以不能实际使用的武器来阻止战争却变成主要的了。伯纳德·布罗迪在关于核政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中写道：

“在原子时代，美国安全计划所考虑的第一件事而且是最重

要的一件事，是采取各种措施使自己在受到打击时有可能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迄今，军事机构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为了赢得战争。今后，这种机构的主要目标定将是防止战争。它不可能有其他目标”。

按照这些条件，核武器的数量不会象人们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希望的那样多。因此，这些年来，两个超级大国都曾经要让别人相信它的威慑是可靠的——如果受到挑衅，他们将要真地实施核威胁。

重要的心理因素是造成各个方面不稳定的根源。例如，早期的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是，为了先发制人，在核战争中，通过第一次打击尽可能获得决定性优势，从而削弱敌方的反击能力。美国战略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双方的稳健派都担心，各自对手有可能试图发动一次本可以获得和解的突然袭击，加之双方都不断地猜疑对方可能会发动袭击的心理升级，结果反而增加了这种袭击的可能性。

对核威慑要考虑的第二个新因素是，任何有效的防御显然是不可能的。许多战略家从开始就认识到，建立一种对付核弹头的绝对安全的防御体系或许始终是不可能的，部分原因是，这种防御体系必须完全有效；面对这种破坏力极大的武器，有效防御达到百分之九十仍是不够的。

进攻性武器占据主导地位，它意味着军方必须承认本国的居民易受到武力的袭击。在传统思想的干扰下，战略家们会相信，如果双方有可能冷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能否免遭袭击，那么相互恐怖的冷战局面则会被打破，双方可能不再处于危险之中。许多专家反对里根总统加紧发展天基反核导弹防御体系的部分理由就在于此。

最近，一位记者把核威慑叫做“自相矛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单纯用于保护居民的武器，象反弹道导弹系统，变成了对和平的最大威胁。针对居民的武器却减少了战争的危险；而针对武器的武器则增加了战争的危险”。

多数战略思想家们最终会感到，核武器打破了军事优势的传统概念。只要一方拥有回击核攻击的大规模报复能力，武器数量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威慑的概念，连同其自相矛盾的解释和实施的困难，支配着对核武器问题的想法。核战略政策辩论的各方都慎重地使用这个术语。遗憾的是，威慑这个术语是含糊的，它既可以搞混问题，也可以说明问题。

这种解释未能说清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威慑是什么？通常的概念是，核威慑为一种目的服务——威慑核攻击。某些官员和政府出版物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例如，美国1984财年的预算方案说，必须保持战略核能力，“使核战争成为我们不可接受的选择”。

但是，美国的政策认为，国家的核威慑力量，是保护美国或其盟国不受常规和核的攻击。用核武器威胁回答敌方对欧洲实行的任何常规武器的进攻，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以下简称“北约”）的“制轮楔”。

“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声称，他们都曾对“威慑”发表意见。关于里根的政策，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评论道，迄今，以“威慑”构成犯罪的次数可能等于以“自由权”构成犯罪的次数。

（二）关于相互确保摧毁和打击军事目标的辩论

关于威慑问题辩论的复杂性，可以用关于有效威慑总要求的两种对立的理论，即用相互确保摧毁和打击军事目标来说明。如前所述，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认为，只要一方具有确保摧毁另一方的能力，超级大国之间就能保持稳定局面。（“摧毁”一词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一般是指轰炸敌方最大城市的能力，从而足以杀死大部分居民、毁坏大部分经济基础。）单从形式上看，相互确保摧毁含义是，在万一进行核攻击时，涉及到的仅是用核武器打击敌方城市。

批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人认为，该理论有一基本缺陷，即缺乏可信性。他们说，依靠相互确保摧毁，将意味着在一场实际的核战争中的自杀或投降。反对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的人主张，美国应该能够以各种核打击手段回答对方的挑衅，而且，美国应该处在赢得核战争的有利地位，并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结束敌对行动。这种战略的关键是“打击军事目标”，也就是说，应以对方的军事设施为打击目标。打击军事目标的鼓吹者们认为，美国应当有选择地或者广泛地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并以此来回答对方的核袭击或其他攻击，这种威胁比摧毁城市的威胁更有把握。

1974年，使公开政策转向强调打击军事目标的主要倡议人、当时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把有关打击军事目标辩论与苏联政策联系起来，他说：

“现在苏联的导弹力量能够有选择地打击城市以外的目标。如果我们打算确保我们的战略威慑的可靠性，我们就有责任，使我们的战略系统和打击目标理论具有可匹敌的能力。”

批评打击军事目标理论的人指责道，选择军事设施为打击目标（特别是把苏联的核力量选作为打击目标），将采用先发制人的、有可能摧毁苏联军事力量的第一次打击威胁苏联。由于打击军事目标理论要求美国保持可靠的第二次打击力量，需要时它即可投入使用；也就是说，在苏联对美国的导弹发动首次打击之后，美国应拥有足够的反击武器来歼灭苏联剩余的力量，这样，美国就可能陷于某种“不可避免的困境”中。国会预算局1978年的一份文件指出：美国的打击军事目标武库很大，在第一次打击中足以威胁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并且在承受了苏联的第一次打击后，仍能够攻击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的这种能力促使苏联继续增强其核力量，并且使核爆炸的“按钮”始终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双方都可能感到是生活在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他们要么使用核武器，要么销毁它。

批评打击军事目标理论的人还指出，两个超级大国都可能利用这种打击军事目标理论进行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为了赶上

对方的部署，双方就要不断增加导弹数量。相反，确保摧毁战略建议对核武器的数量规定某种限制。打击军事目标的反对者认为，打击军事目标战略忽视了下述事实，即大量的军事目标位于城市或接近城市，因此军事、居民或经济目标的差别在理论上很难区分，不易选择。

而且，大量事实说明，由大规模战争引起的整个环境的破坏有可能超过瞬时效应。主张瞄准军事目标的人时而提出，核战争可能采取打击军事目标的消耗战方式。这种核战争给环境带来的后果虽然难以预料，但多半是灾难性的。多少年来，专家们一直辩论核战争的长期影响问题。与公众的理智相反，某些保守分子指出，人们根本不能肯定，一场全面的战争会导致文明的完全毁灭。但是，1983年秋天所发表的几项研究报告提出，核战争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然而，甚至许多批评美国打击军事目标政策的人也对苏联的政策和能力有所警觉。与美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官方关于核武器的政策和军事理论也一向是矛盾的、含糊不清的。事实是，近二十年里，苏联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由于这种导弹的命中精度高和飞行速度快，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已成为一种更高级的打击军事目标武器。相比之下，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在目前还不具有摧毁军事硬目标的命中精度，而核轰炸机又不具有构成突然袭击威胁的速度。

虽说西方政府对苏联军事实力的估计有些过分夸张，但是，苏联拥有强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实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道：1982年末，苏联拥有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发射5678枚弹头，而美国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仅能发射2151枚弹头。许多观察家一致认为，美国继续拥有海上和空中战略力量的优势。

因此，美国的战略力量委员会在1983年4月向里根总统提供的一份报告中得出下述结论：

“战时，苏联作战导弹的性能可能比试射时的性能差些，然